

# “怒人”是谁？ ——文化视野中的怒族源流

何 林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在民族学研究领域,由于“怒族”建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怒族族源及流变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清晰脉络。离开这一建构模式,从文化视角则不难看到“怒人”或“怒族”各部不同的族源历史及文化特性。汉语文献传统及中国国家民族识别所建构的“怒人”或“怒族”事实上包括族称发音及表音汉字书写相近的四个民族群体,他们分属两个语支或两个历史文化范畴,而“怒”的形成则是一个族称演化的结果。

**关键词:**怒族;怒族各部;怒族族源;族称演化;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70-07

## Who are the Nu People? ——The Origin of the Nu Ethnic Group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HE Lin

(Centre for Southwest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y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there is still no clear reorganization abou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Nu Ethnic Group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from the factors such as its construction model. Besides the construction model, it is easy for us to find th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rom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Nu people. The Nu ethnic group in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nd from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cludes four groups sharing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nam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four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language branches or tw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tegories, and the name “Nu” is the evolution of one of the groups.

**Key words:** the Nu ethnic group;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f the Nu; the origin of the ethnic group; the evolution of the ethnic na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中国民族识别确定的怒族按自称包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的贡山、福贡、泸水县、兰坪四个县:1. “阿怒”<sup>①</sup>(a<sup>31</sup>nuŋ<sup>55</sup>),也称“贡山怒族”,主要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丙中洛、捧当、茨开、普拉底等四个乡镇中,人口为6297人(2007年),此外,居住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所辖松塔、龙普两村的门浪人(mə<sup>31</sup>lai<sup>35</sup>)大部分自认与贡山“阿怒”

和独龙族为同族,使用同种语言,人口共400人(2008年),另有“部分原居住在竹瓦根乡的吉太村,后迁至嘎巴村”<sup>[1]</sup>;2. “阿依”<sup>②</sup>(a<sup>31</sup>noŋ<sup>31</sup>),主要居住在福贡县的上帕镇、鹿马登、架底等乡镇,人口约5900人(2007年);3. “怒苏”<sup>③</sup>(nu<sup>35</sup>su<sup>55</sup>),主要聚居于今福贡县匹河、子里甲乡等地,原属碧江县<sup>④</sup>,称“碧江怒族”,人口约13900人(2007年);4. “若若”<sup>⑤</sup>(zo<sup>33</sup>zo<sup>31</sup>),也称“兰坪怒族”,居住在兰坪县兔茷乡

收稿日期:2012-03-28

基金项目:201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课题“‘桥头堡’国家战略的‘民间策略’基础——以对缅甸公共外交实践为例”(JD2011YB06)

作者简介:何林(1971—),男,云南石屏人,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及中国西南族群与宗教、实践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①在一些著述和资料中写作“阿龙”,这纯属部分调查者记音不准确或笔误所致。笔者在贡山县茨开、捧当、丙中洛等地的调查中均未发现其自称中含有近似“龙”(loŋ<sup>55</sup>)的发音。笔者注。

②福贡县的“阿依”在一些文献中也写作“阿怒”(a<sup>31</sup>nuŋ<sup>55</sup>),1986年以前的文献中也称“福贡怒族”,为同一或相近发音的两种不同汉字表示方法。为便于与贡山“阿怒”进行区分,建议使用“阿依”。笔者注。

③一些文献中也写作“诺苏”,为方便区别于彝族支系“诺苏”,本文也建议使用“怒苏”作为原碧江怒族的自称。

④碧江县于1986年12月撤销县建制,所属5乡分别并入福贡、泸水县,其中“怒苏”主要聚居的匹河乡并入福贡县。

⑤许多现代文献中写作“若柔”,本文根据其发音近似原则使用“若若”为其自称的表音汉字。笔者注。

和泸水县鲁掌镇,人口约3 800多人(2007年)。<sup>[2]14①</sup>此外,在维西县还散居少数怒族,约有200人。<sup>[3]1②</sup>

有关“怒”或与“怒”发音近似的族称始见于明朝(14世纪末至17世纪中)初期的文献,如“弩人”、“怒人”、“怒子”、“怒夷”等。这一称呼的范围,在汉语语境中,历经明、清和民国时期,与当今“怒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大致相当。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怒人”中贡山“阿怒”、福贡“阿依”与原碧江“怒苏”、兰坪“若若”的差异,前二者与“傣”(今独龙族)的“近亲”关系以及与景颇(族)的较近关系,后二者与“彝族”的较近同源关系,以及“将独龙族和怒族合并,把独龙族和日旺族看作统一社区的一个共同体”的主张<sup>[4-5]</sup>,但最终均未被采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通过国家民族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了的民族,怒族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在学术上也多以一个民族共同体被表达。在由这一表达框架所形成的族际边界内,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特征的努力,不论是在国内怒族研究还是在族内事务方面,一直都在进行,因而怒族各部分组成人群<sup>③</sup>间族源、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往往被刻意忽视或模糊化,甚至以其中某一部分人群的特征为代表覆盖或遮蔽其它人群的特征,其结果是使得“怒族”的边界继续被强化,同时建构出一个“色拉状”的民族文化符号和文化实体。即便怒族各组成人群的自称、聚居地、人口、语言文化特点等基本信息在许多著述中一般都按学术规范作了说明,但仍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在民族学研究领域,这一倾向使有关怒族的知识内容显得混淆不清,而关于怒族族源及流变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清晰脉络。有关文献缺乏是一方面的原因,关键仍然在于“怒族”建构模式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使得对各族称部分历史、文化差异的忽视或回避。笔者以为,对于怒族的研究首先必须超越这一表达框架和族群边界,一方面充分理解和尊重各组成族群间的差异性,分别进行考察,同时通过对其他相近或相关民族的研究来辅助和支持关于怒族研究。

### 一、文化视野中的“怒人”

由于怒族各部及相关民族无传统文字,汉语文献记载过于宽泛,而且可得资料数量极其有限,相关民族志资料严重缺乏,单一的历史学方法对于这些族群源流问题的梳理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在当代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文化比较可能有一定效果。

怒族各部 and 傈僳、藏等民族在生计方式、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相似性、相互借用和共有的情况,因而可比性较低,但语言(除非已完全消失)的核心结构和内容,仍然在表达与其它族群的文化心理差异,而亲属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了这些民族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sup>[6]</sup>。因此,本文怒族各部的文化比较主要集中在语言、亲属制度及与之关联的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

#### (一) 语言

怒族的语言,包括贡山“阿怒”语(含独龙语)、福贡“阿依”语、原碧江“怒苏”语、兰坪“若若”语,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已不存在争议,但各部所属语支则众说纷纭。综合而论主要有如下观点:1. 属藏语支<sup>[7-8]④</sup>:怒语(“阿怒”语,笔者注)与傣“独龙”、藏、嘉戎、羌、西番(普米)等同属藏语支;2. 属于景颇语支<sup>[9]</sup>:怒语(“阿怒”语、独龙语、缅甸怒人诸语,笔者注)与景颇诸语同属景颇语支;3. 属彝语支<sup>[10-11]</sup>:怒语(“怒苏”语、“若若”语)属于彝语支;4. 属独立语支<sup>[12]</sup>:怒语(“阿怒”语,笔者注)、独龙语是与嘉戎、缅—傈僳语并立的一个语支,怒语(缅甸境内的怒语)是缅语族的一个语区。<sup>[13]</sup>另孙宏开在他的《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系属分类》一文中的分类,把雅碧江、金沙江、怒江等八江流域的藏缅语族诸语种,归纳为藏语、彝语、羌语、景颇语和缅语等五个语支。在诸语支中,景颇语支包括景颇语、独龙语、珞巴语和僛语等四个语种;缅语支包括缅语、阿昌语、载瓦语和怒语(怒苏)等四个语种。<sup>[14]</sup>就怒族各部语言语支划分问题,鉴于“怒苏”、“若若”与具有彝、缅语支的一般特点,赞同将“怒苏”、“若若”与划属彝语或缅语支或合并为彝缅语支的观点<sup>[14]</sup>;鉴于贡山“阿怒”、福贡“阿依”及独龙族语言“相同语言的不同方言”关系及与景颇语的近似性,以及这些怒族、独龙族与景颇族在历史、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相似性,“阿怒”、“阿依”语和独龙语可划属景颇语支。

在怒族各部语言交通问题上,据调查,贡山、福贡及碧江三地的怒语差别很大,不仅词汇不同,而且语法结构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贡山“阿怒”语与原碧江“怒苏”语差别最大。贡山怒语与独龙语完全可以通话,词汇方面根据459个词的比较,其中语音词义全同的词约占40%,词义相同语音相近的约占33.3%,其余约有26%的不同的词,但都有显著的

①怒族各组成人群2007年以后人口数均为笔者统计数字,参看文后参考文献[2]。

②见文后参考文献[3],这部分“怒族”属何部暂无进一步研究。

③部分文献中使用“支系”一词。研究表明,怒族各部可分属两个较远的族群来源,因此建议使用“怒族各部分组成人群”或“怒族各部”进行表述。笔者注。

④参见文后参考文献[7]和[8]。贡山“阿怒”(含西藏松塔、龙普两村的门浪人)、独龙江一、二村独龙族不同程度地使用藏语、藏语词汇和表达方式。笔者注。

对应规律。<sup>[3]5</sup>孙宏开认为,贡山怒语(阿怒语)与独龙族属于同一语言(独龙族)的两种方言——独龙河方言和怒江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都有一些差别,但不很大。<sup>[15]</sup>根据笔者在贡山县丙中洛乡的茶腊、丙中洛日当、秋那桶以及捧当乡迪麻洛等村的调查,贡山怒语中使用来的大量的藏语(德钦方言)词汇,语法不变,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傈僳语词汇(如取名等,基督教用语),而独龙族中使用的傈僳语词汇较少,独龙江三、四村的独龙族中使用的藏语较少,与福贡“阿依”方言上更为接近。福贡怒语(阿依)与贡山独龙族能部分通话,语法现象基本一致,根据459个词汇的比较,其中语音词义全同的词约占10%,词义相同、语音相近的约占25%。但(原)碧江怒语(怒苏)与福贡阿依语、贡山阿怒语、独龙族差别很大,彼此不能通话,在语法方面,贡山怒语、独龙族及福贡怒语均具有特殊的动词变化,但碧江怒语则无此种动词变化;词汇方面只有10%相同或相近,并找不出语音上的对应规律。根据上述特点看来,碧江怒语与贡山、福贡员的怒语差别很大。

兰坪“若若”语与“阿怒”、“怒苏”语完全不能通话,有学者认为若柔语属于彝语支。<sup>[3]5-7</sup>而1960年云南民族识别综合组专家认为:1954年识别调查,认为“兔峨”话与碧江县怒族语相接近;1958年省语文工作队实际调查,认为“兔峨”话与巍山彝语差别较大,但从语音、语法看,又接近彝语。<sup>[16]</sup>

在怒语与景颇语对比方面,描述极为模糊,仅提及景颇语与贡山怒语及独龙族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没有专门的研究资料可循。根据李向前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怒族(贡山“阿怒”)语与景颇大山支语绝大多数相同,而独龙族语与贡山县的怒族语的相同率达90%以上。换言之,大山(景颇)支与独龙族和贡山怒族的怒族操同种语言,而福贡怒族(应为今福贡“怒苏”,笔者注)语与景颇族小山(载瓦)支相通。由此可见,独龙族、怒族(“阿怒”)和景颇族在历史上是同一族群……<sup>[17]①</sup>

## (二) 亲属称谓制度

从亲属称谓的核心结构来看,景颇语支族群,如贡山阿怒、独龙族、福贡阿依完全相同,与景颇极为相近,就内容来看,阿怒依次与为独龙、阿依、景颇近似,区别主要在于称谓发音以及使用注音汉字有异。景颇亲属称谓较详细,除称呼对象的性别、辈分外,还区分称呼者的性别、直称与人称(一、二、三人称),被称呼者的年龄长幼、数等因素。<sup>[18]②</sup>在阿怒的亲属称谓中:1. 父亲的称谓与父亲兄弟的称谓不同,阿怒称“阿别”/“阿爸”(直称),阿依称“阿拍”,独

龙称“阿摆”,记音汉字不同,但为同一词汇的不同方言发音,而景颇称“瓦”;2. 母亲的称谓与父亲兄弟妻子的称谓不同,阿怒称“阿弥”/“阿妈”(直称),阿依称“阿每”,独龙称“阿嫫”,同样为同一词汇的不同方言发音,而景颇称“怒”;3. 父亲兄弟与母亲姐妹的丈夫使用同一称谓,阿怒称“阿翁”,阿依、独龙族称“阿旺”,景颇称“瓦”,与父亲同;4. 母亲的姐妹、丈夫兄弟的妻子用同一称谓,阿怒、独龙称“阿秋母”,阿依称“几昌”,景颇称“努”(与母亲同);5. 母亲的兄弟、妻子的父亲(岳父)、丈夫的父亲(公公)、父亲姐妹的丈夫使用同一称谓,阿怒称“阿克”,独龙称“阿肯”(与阿怒一致,属不同方言发音),阿依称“阿本”,景颇称谓较细化,前二者称“阿札”,后二者称“阿古”;6. 母亲兄弟的妻子、妻子的母亲、父亲的姐妹、丈夫的母亲使用同一称谓,阿怒、独龙称“尼尼”或“阿尼”,阿依称“阿陇”,景颇称谓较细化,前二者称“阿尼”,后二者称“阿梅”。<sup>[19-20]96</sup>原碧江怒族(今福贡县“怒苏”)、兰坪若若亲属结构和关系与上述不同。其中:1. 怒苏人的父亲、父亲的兄弟及母亲姊妹的丈夫同称“奥扑”,而父亲姊妹的丈夫则称“古谋”;2. 母亲、母亲的姊妹及父亲兄弟的妻子同称“奥米”,而父亲的姊妹则称“奥日”;3. 母亲的兄弟称“奥颇”;4. 母亲兄弟的妻子称“奥辟”;5. 妻子父亲、丈夫的父亲同称“啄博”;6. 妻子母亲、丈夫的母亲同称“楠荷”。<sup>[21]39</sup>而兰坪若若的亲属称谓中:1. 父亲、妻子的父亲、丈夫的父亲同称“阿薄”;2. 母亲、妻子的母亲、丈夫的母亲同称“阿买”;3. 父亲兄弟、母亲姐妹丈夫的称谓同,其中父亲兄称“阿董”,父亲弟称“阿叔”;4. 父亲兄弟妻子与母亲姐妹称谓同,其中父亲兄妻称“阿董莫”,父亲弟妻称“阿叔米”;5. 父亲的姐妹与母亲兄弟的妻子称谓同,其中父亲姐姐称“阿以”,妹妹“阿米丫”;6. 父亲姐妹的丈夫及母亲兄弟同称“阿普”。根据兰坪若若,其亲属称谓在七八十年以前父亲与父亲兄弟称谓相同,由此说来,其上一辈亲属称谓只有父亲“阿薄”、母亲“阿买”、母亲兄弟及父亲丈夫“阿普”三种。

阿怒、阿依、独龙以及景颇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理想婚姻模式是单项循环的姑舅表婚或交表婚,以景颇为代表,或可称谓“景颇式”的亲属称谓。而怒苏、若若人中则无此种婚姻模式。

## (三) 婚姻家庭制度

从亲属称谓制度看,阿怒、阿依以及独龙和景颇一样,单向循环的姑舅表婚是理想的婚姻模式。根据20世纪50年代贡山一区(丙中洛)的调查资料,这种婚姻模式至1949年前后仍然存在于阿怒社会

①但笔者认为,贡山“阿怒”、“傣”与景颇(大山)的分化应早于9世纪,或在唐代以前,他们属景颇语支,不可能是属彝/缅语支的(古)浪速或浪峨人后裔。

②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8]。以下关于景颇族亲属称谓的内容也参看此文。

中,贡山怒族(阿怒)“还继续遵循氏族外婚的原则。”<sup>[21-22]84,94</sup>根据笔者2004年在贡山县丙中洛一带的调查,阿怒的姑舅表婚1949年前后虽然比例不高,但仍然被认为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以后逐渐减少,特别是1981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婚姻法以后<sup>①</sup>。这一婚姻模式现已不再具有优先性,但有违此种婚姻形式的婚姻,如平表、姨表仍属禁忌,这一禁忌可推延至三代以内。此外,娶男子、转房的婚姻习俗仍然普遍。<sup>[2]</sup>福贡阿依由于受傈僳族的影响以及基督教的传入(1932年)<sup>[21]118</sup>,这一婚姻模式早在1949年以前就消失了。根据上世纪50年代的调查,“在选择配偶上,怒族(阿依)没有固定的婚姻集团,除了亲胞兄弟姊妹外都可结婚。我们在一个小自然村三十户人家普查的结果,发现有叔伯兄妹婚五人,姨表婚两人,不同辈次非近亲结婚的五人,另六人是与外家族的婚配。”<sup>[21]71</sup>独龙具有单向循环姑舅表婚的一般特点。根据《独龙族简史》,独龙族婚姻制度中每个氏族有(至少)两个固定的通婚集团,通婚方向为单向、流动方向为环状流动。此外,妻姐妹婚、非等辈婚、转房制也不同程度存在。<sup>[19]86-94</sup>怒苏人不存在交表婚,以20世纪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来看,氏族内婚和家族内婚是其婚姻配偶关系中较为突出的特点。<sup>[21]40</sup>

福贡和贡山的怒族(阿依、阿怒)在社会组织及其它文化特征方面已与(原)碧江怒族不同。碧江怒族尚保存着较为明显的氏族组织和图腾崇拜,并且以女始祖茂充英开始,以下从第3代起至63代,都有完整的父子连名制,而且这种连名的形式与今日大、小凉山黑彝——诺苏及元阳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特点相同,即一字连与二字连相互交替。如碧江第九行政村“斗霍”胞族所属蜂氏族——“别阿起”家族。<sup>[23]89</sup>但贡山、福贡两县的怒族没有氏族图腾及父子连名制,在社会组织、生活习俗方面,也有许多差异。<sup>[23]11</sup>同属景颇语支的族群景颇支从来不使用父子连名制,而景颇族支系载瓦、浪速、茶山和布拉都使用父子连名制,载瓦传到第22代陈日汤时,景颇支的勒排奥拉当(Lahpai Aura Tang)进入载瓦地区当官,自此以后便终止了父子连名制。<sup>[24]3</sup>

从语言、社会文化看,阿怒与阿依、独龙为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甚至与景颇族景颇支族源关系较近而与怒苏、若若较远,可为不同的民族系统。本文将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和上述语言、文化的比较尝试对怒族各部及其他相关族群的源流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 二、“怒人”的族源及流变

“怒人”在明代始有记载,但缺乏进一步的说明,文献中所述之“怒”为“阿怒”、“阿依”,还是“怒苏”、“若若”的先民,还需对照相关历史背景、地理

位置并结合有关民族志资料才能判定。这一文献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那么“怒人”各部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上述对比表明,怒族并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可分属两个差异较大的文化系统:景颇语支族群、缅甸语/彝语支族群。而从与怒族形成的时代更为相近的材料看,怒族的族源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一是来自古代“庐鹿”蛮的一支“诺苏”,另一部分则可能源于怒江北部地区、贡山一带自称“阿怒”或“怒”的古老族群。<sup>[3]9</sup>而刘达成先生认为,“庐鹿”与“诺苏”有别,唐代“乌蛮”之“庐鹿”蛮部应为今兰坪怒族“若若”(或写做“柔若”)的先民,而“怒苏”则与今大小凉山彝族“诺苏”同源<sup>[22]1-4</sup>,“诺苏”、“庐鹿”(即“罗罗”)同为“乌蛮”后裔,即今彝族中自称不同的部分。

### (一)氏羌后裔

“聚居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氏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sup>[25]</sup>在西北的甘青高原上,是氏羌部落群体的主要游牧聚居区。(见《后汉书·西羌传》)公元前7世纪、4世纪秦国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引发了氏羌族群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迁徙。在此迁徙过程中,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族群(如景颇、独龙、阿怒、阿依、僛人、珞巴等<sup>[24]2</sup>)的先民从甘青高原向西迁徙,在先秦时期就已越过金沙江,抵达澜沧江河谷的昌都一带,两汉时期或已沿怒江河谷南下到八宿、察隅一带,在(唐初)西藏松赞干布发动的统一战争中,一部分向西到墨脱、米林和隆子等地,逐渐分化为珞巴和僛人的先民,一部分向南进入独龙江地区,成为独龙族的先民,景颇人则继续沿独龙江南下到恩梅开江流域,与东路来的寻传人会合,发展成为现代的景颇族;与此同时,彝、缅甸语支族群(含寻传人)的先人(包括彝族、傈僳族、怒苏、若若、阿昌、缅甸族及今景颇族的载瓦/小山、浪哦、喇咪/茶山、布拉等族群<sup>[24]2</sup>)则向南迁徙,在先秦时期就已抵达雅砻江流域,到两汉时期,其中的僛、昆明部族又越过金沙江和澜沧江,抵达大理和保山一带,有的已到了腾冲北部,到唐宋时期,僛、昆明部族中的寻传人,除部分还留在雅砻江流域外,大部分都已越过怒山山脉、怒江和高黎贡山,抵达恩梅开江流域。<sup>[24]12-13</sup>尤中先生认为景颇语支族群的先民是“裸形蛮”或“野蛮”而非上述的“寻传”。由于已经在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一带汇合,《南诏德化碑》等文献所说的南诏时期西部的“寻传蛮”已经括了近代的阿昌族和景颇族中载瓦的先民在内。<sup>[26]</sup>由此说来,今景颇族之景颇支、独龙江的独龙族、缅甸北部日旺等族群的祖先(或部分)在唐代

①新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已经在恩梅开江上游(独龙江)一带生活了。

## (二) 若若与怒苏

根据尤中先生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境内的民族群体、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基本上分属于氏羌、百越、百濮(孟高棉)三个系统,而氏羌系统中的叟、昆明族(汉晋时期)之各部分,南北朝以后逐步分化出“乌蛮”、“施蛮”、“顺蛮”。其中:云南北部“乌蛮”七部落中包含“卢鹿蛮”(今部分彝族支系、若若的先民,笔者注),唐朝前期分布在四川凉山雅砻江以东至云南北部地带,西部“乌蛮”含今楚雄、大理,初有70余部,后相互兼并至开元年间(公元713至741年)剩下六至八个较大部落,史称“六诏”);“施蛮”、“顺蛮”在唐朝前期,仍然包含在“乌蛮”中,但到南诏时期(公元752—902年),乌蛮将“施蛮”、“顺蛮”从乌蛮集团中抛出,前者已经专指近代各个方言区的彝族祖先,而后者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乌蛮”的民族,元代被称为“卢蛮”,明以后称栗些或栗粟,即傈僳族;同属氏羌后裔的“寻传蛮”,大概南北朝以后绝大部分已迁移到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丽水)收油地带,但仍然有极少部分住在雅砻江与金沙江河流地带,曾居于南诏西南部,即汉晋时期的永昌郡内,元、明时期已明确过去的“寻传蛮”为“阿昌”,或写作“蛾昌”。“寻传蛮”为今阿昌族、景颇族中茶山人(载瓦)、浪峨人的先民。<sup>[27]</sup>

《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中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蛾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丽江路辖今丽江地区、怒江州、迪庆州南部之地。其中:“罗落”(即罗罗)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乌蛮”发展而来,明代以后仍沿用此名,常写作“罗罗”,“罗罗”为今彝族的别称,但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名称较为复杂;“蛾昌”基本对应于南诏时期的寻传,元代称蛾昌,后写作阿昌,为今景颇族之载瓦(小山)、喇嘛(茶山)、浪峨、布拉以及阿昌族的先民;“撬”即“傈”,主要指居住在今独龙江的人群(独龙),傈族居住区在丽江府西部澜沧江大雪山外的傈江流域一带,与怒族居住区域接壤,氏族和部落对他们自己和别人都是一种严格的界限,所以他们的居住区虽然与怒族相接,但却不敢越界相与往来(参见道光《云南通志·人种志》引《清职贡图》);“卢”指“卢蛮”,从南诏时期的施蛮、顺蛮发展而来,《元一统志》丽江路《疆界》说:“西至兰州冰琅山(怒江州境内之碧罗雪山)外卢蛮界四百八十里”,明代以后称栗些,栗粟,即傈僳。<sup>[27]</sup>

元代并未提及的明代“怒”或“怒人”的先民又分别是谁呢?首先,据尤中先生说,南诏北部“乌蛮七部落”中有一个部落称为“鹿卢”(与“卢鹿”同)。往后,“鹿卢”被译作“罗罗”,成为了这个近亲集体共同称呼。天启《滇志》卷三十即说:“其初种类甚多,有号鹿卢蛮者,今讹为罗罗(彝族先民的统称)。”这都说明,“罗罗”的称呼由“鹿卢”衍化而

来。<sup>[28]</sup>元代时,人们将建昌(今四川西昌)、乌蒙(今云南昭通一带)的彝族皆称为“卢鹿蛮”。而元代文献中,兰坪沿岸居住着“卢鹿”部。《元史》志第十三《地理四》称:“兰州(今兰坪县),在澜沧水之东,……唐为卢鹿蛮部。”<sup>[29]</sup>从“若若”的发音“zo<sup>33</sup>zo<sup>21</sup>”来看,与“卢鹿”、“罗罗”为同一词汇的不同变音。从若若人“送魂”线路和迁移史看,其迁移经过大理永平、云龙后定居于兔峨,并无经过丽江、剑川、兰坪北部的说法,而今云龙表村一带及云龙澜沧江流域居住着与若若相近的人群(白族)。<sup>[22]1-4</sup>由此看来,“若若”即“卢鹿”,为自称“罗罗”的彝族支系。

从族称和文化对比看,“怒苏”与彝族支系“诺苏”在发音、含义及文化上基本相同,其中“诺”语义为“黑”,“苏”为“人”之意,应为同一族群的不同分支。“怒苏”是怒江的久居族群,按“怒苏”人的家谱推断,在怒江居住可有一千余年了。明代以后的文献作者将“怒苏”人的自称与怒江联系在一起,称其为“怒子”、“怒人”、“弩人”,后确定为“怒族”。如《元混一方輿胜览》卷中记载:“潞江,俗名怒江,出潞蛮。”那元代的“怒苏”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认为此时怒族(仅指怒苏)的先民还未从卢蛮(傈僳族先民)分化出来,直到明代以后。<sup>[25]</sup>笔者认为,从历史、文化角度上来说,怒苏不是傈僳,他们更有可能是彝族“诺苏”的部分,属于与“罗罗”历史文化关系更近的族群,由于地域关系被文献作者们“包含”在“潞蛮”或“卢蛮”中。明代以后在文献中明确了族称的“怒人”(含怒苏的先民)与“傈僳”在元代虽然可能笼统地被称为“潞蛮”或“卢蛮”,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同一族群的不同分支,因为不论是“潞”还是“卢”,它首先是一个地名,其名之下可能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人。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进入怒江以后,由于与傈僳的先民卢蛮比邻而居,怒苏,也或其他“怒人”的先民极易与傈僳族的先民一起被文献作者们统称为“卢”,直到明代才被从文献中分开。

对于“怒苏”与“若若”的来源,有学者认为他们同为古浪峨人的部落,属于浪宋(也写作“浪速”)人支系,与阿昌、载瓦、茶山、浪速人为同一祖先。<sup>[30]48</sup>至于“卢鹿”与古浪峨人的族群关系,阿昌、载瓦、浪峨等人群的先人寻传蛮在南诏国时期与“罗罗”或“卢鹿”的前身“乌蛮”等在东泸水(雅砻江)、磨西江(金沙江)一带杂居,说明他们是近亲。<sup>[30]189</sup>古浪速人的后裔阿昌、载瓦、茶山、浪速与彝族、诺苏、若若等同属于彝语/缅语支,有较大的亲源关系。公元7世纪初期,古浪峨人入侵洱海地区,先后在洱海区域北部建立了浪穹、施浪、邓赕三诏,后三诏为南诏征服。古浪峨人应该在唐代与“乌蛮”分化而向南向西迁徙。从族称、语言等方面的比较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怒苏”、“若若”与“诺苏”、“卢鹿”同源的观点。

## (三) 怒、傈及独龙

根据上述资料,今独龙族先民在景颇迁移史(唐

代)及元代(《元一统志》)都有记载,那么阿怒和阿依的先民却只字未见,直到明代。那么这些人群从何而来?从语言、社会文化特点比较来看,贡山阿怒、福贡阿依、独龙族以及现居缅甸北部的日旺(缅甸北部与中国独龙族近似或相当的各氏族的总称)各氏族应该在某个历史时期与景颇先民同源,或属于与其先民“裸形蛮”或“野蛮”关系非常近的古老族群,而怒苏、若若应属叟、昆明族之后裔乌蛮部的部分。洪俊等学者也从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传说、婚姻制度、氏族关系等方面提出独龙族(也包含阿怒等)与景颇族同源的观点。<sup>[31]48</sup>从民族迁徙来看,关于独龙(日旺)、珞巴、僜人与景颇从西线迁徙的氏羌后裔(如裸形蛮)中分出的说法合乎逻辑,但仅有部分缅甸北部的日旺人认为其与景颇的发源地“木拽省牙崩(Majoi shingrabum)”相同<sup>[32]2</sup>,而中国独龙以及与独龙同源的现居在怒江流域的贡山阿怒、福贡阿依人并无此明确的发源地和清晰的迁徙路线,也无送魂路线,却有“来自东方”的传说<sup>[2]65</sup>。缅北的日旺(独龙)有从“太阳出的地方(即东方的中国)”迁去的说法<sup>[19]2</sup>,独龙有“来自怒江”的传说<sup>[31]2</sup>,另据福贡木古甲阿依的一个传说:“……怒江边有三兄弟,后来大哥顺流而上,迁往北方,二哥向西翻越高黎贡山迁入缅甸,小弟弟留在了今天的怒江边上,是阿依人的祖先。‘大哥’迁往的方向即贡山怒族(阿怒)居住区;‘二哥’西迁缅甸,独龙族人‘日旺’中包含有自称‘阿依’的支系。”<sup>[33]</sup>此外,近代还有从福贡、贡山普拉底等地迁往丙中洛的传说<sup>[21]74</sup>笔者认为:族群的迁移路线应具有多线性、多向性、多时性以及延时性等特点,即一个族群可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路线、抵达同一或不同区域,迁移历时可有近千年前的迁移,也有近百年的迁移,可从甲地迁往乙地,也可从乙地迁往甲地。从历史、语言、文化特点看,贡山阿怒、福贡阿依、独龙族、缅甸日旺—独龙可能与景颇先民“裸形蛮”或“野蛮”同源或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或属于一个与景颇先民关系亲近的没有文献记载的古老的民族群体,其部分可与景颇先民“裸形蛮”自甘青高原南迁,后居于梅恩开江、迈立开江上游地区,再向多个方向迁移;而部分古老的近亲族群则可沿氏羌系族群东路向南迁移,先后有分支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多次向西跨过澜沧江、怒江迁移,部分居留于怒江流域,部分则继续向西,与其同族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之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一带汇合。内地到怒江流域的道路就局限于几条线:“在北,自菖蒲桶(民国时贡山县驻地,位于今丙中洛打拉村,笔者注)过怒江,越碧罗山至叶枝,渡澜沧江经康普至维西;其南,自知子罗越碧罗山,在营盘街渡澜沧江至兰坪;又南,则老窝、鲁掌、六库等地,经漕涧渡澜沧江至云龙;又怒江两岸各地沿江而下,至保山、腾冲。由于道路相通,分别与各地有政治联系。”<sup>[34]</sup>另据高志英调查,从贡山的腊早翻越碧罗雪山至维西岩瓦为又一交通要道。<sup>[25]</sup>笔者认为,贡山阿怒、福贡阿依及独龙族先民

之一部分,可能从北部三条线路进入怒江:一部分从维西经康普抵达菖蒲桶,部分从维西抵达贡山腊早,但目前尚无文献和口传史说明贡山阿怒及独龙族是从上述二条线路进入贡山;部分从兰坪经营盘、知子罗抵达今木古甲、古泉一带,部分向北到贡山,部分向西进入缅甸,部分即今福贡阿依。关于兰坪—怒江线路,据今天居住在独龙河谷的老人们说,他们的祖辈很早以前是从丽江、剑川、兰坪等地陆续迁居到怒江流域的贡山一带,然后又分数支西迁到独龙江和恩梅开江上游。<sup>[19]9</sup>另据缅甸怒苏人付三益的考察,有缅北葡萄一带独龙族(日旺)的口传迁移史中记载了知子罗一带的地名,曾寻根至此。不论从哪一条路线进入贡山,阿怒先民的部分辗转有进入贡山独龙江,再有部分进入缅甸,如葡萄县一带,一支则往北迁往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松塔、龙普两村;部分今居住在缅甸独龙—日旺、阿依却是从木古甲、古泉一带进入缅甸,在葡萄县一带居住。这些不同时期迁居缅甸北部的“怒”、“依”、“独龙”的先民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汇合并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了许多分离状的氏族、家庭公社。当然,怒苏人也随后经兰坪至知子罗的路线进入怒江。至于“目前居住在福贡上帕、鹿马登一带的自称为‘阿依’的怒族则是从贡山顺江迁徙而来的”<sup>[22]5</sup>的说法,笔者认为缺乏有力证据,也可能是近现代民族迁移的特例。

阿怒、阿依、独龙先民的迁徙过程一直都在进行,分布成形时间较早。根据原碧江县普乐乡怒苏人的64代家谱及居住怒江43代史的说法,怒苏人进入怒江应在唐朝后期(南诏时期)<sup>[3]8</sup>,而阿怒等的先民进入怒江还更早。至于阿怒等的先民何时进入怒江,在元、明以前的汉文史籍中难以考证,但从这些族群居住地的历史沿革来看,自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益州郡、永昌郡以来,独龙江、怒江流域这一带地区各少数民族便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唐、宋两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sup>[19]13</sup>有地方学者也认为,阿怒等的先民进入怒江的迁移始于西汉时期。<sup>[35]</sup>根据缅甸阿依学者Khin Phang Htain,“阿依”公元前约600年已在中缅边境一带居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迁居缅甸成为日旺人,他们经过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大约在公元400~500年已生活在缅甸葡萄一带。<sup>[32]</sup>到元代,根据有关元代的文献,“撣”或“俅”(今独龙族先民)已与贡山阿怒、福贡阿依发生分化了。

按照汉语文献的习惯和传统,元代“撣”或“俅”主要专指俅江之民(今独龙族),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包含了今独龙族、贡山阿怒、福贡阿依及与缅甸独龙—日旺杂居的阿依人。在缅甸,包括日旺—独龙、阿依均被傈僳族称谓“俅帕”,甚至景颇被称谓“俅”。时至明代,居于怒江的不论是贡山阿怒、福贡阿依还是怒苏均被统称为“怒人”。

### 三、结论

在汉文文献传统及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区分怒



族各部的目的主要在于说明其地理位置及作为自称符号的特点,如贡山怒族(阿怒)、福贡怒族(阿依)、碧江怒族(怒苏)、兰坪怒族(若若),而其在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往往被忽视或回避。离开这一建构框架,从文化视角则不难看到“怒人”或“怒族”各部不同的族源历史及文化特性,以及建构与文化不重叠的事实。

从上述文化看,阿怒、阿依、独龙属景颇语支,同时具有景颇语支民族的一般文化特点,怒苏、若若虽有所不同,但均属彝语支,具有彝语支民族的一般特点;从历史来看,阿怒、阿依和独龙可为同一族源,且可与景颇的族源关系较近,而怒苏、若若则可与部分彝族支系同源;从迁徙路线看,阿怒等的先民可与景颇先民一同沿氏羌民族迁徙的西线(怒江以西)自北往南迁,也可沿东线(怒江以东)迁徙,但在较早的时间向西跨过金沙江、澜沧江抵达怒江,部分又过怒江进入伊洛瓦底江上游,而怒苏、若若的先民则沿东线南迁,进入澜沧江流域,怒苏转而进入怒江;从进入怒江的时间来看,阿怒、阿依等族群较怒苏要早得多。那么“怒人”又是从何而来呢?自唐代以来,文献中曾使用“庐鹿”、“泸”、“卢”、“洛”、“潞”、“怒”、“弩”及其它发音相近的汉字称呼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彝语支民族,事实上在许多地方民族和汉族口语中,“n”和“l”的发音是不区分的,极易混淆,而“怒”的形成是一个族称演化的结果。元以后,庐鹿写成了“洛”或“罗罗”(含若若)为部分彝族的自称,“卢”在明代以后演化为傈僳,明清时期怒苏也逐渐被文献作者所识别,并写作“怒子”,与此同时,位居怒苏之北,未曾在文献典籍中出现的阿依、贡山的阿怒由不同的文献作者写作“怒”或“弩”。而独龙的先民则在元代已被称为“撬”(后写作“俅”)。于是,历史、文化不同但族称近似的“怒”就在文献作者们的笔下成形了,此后经过一些学者“统而论之”,怒江地区除傈僳、藏、佤之外的一个久居族群“怒”作为就被建构起来了。

#### 【参考文献】

- [1] 段伶. 西藏察瓦隆怒族社会考察散记[G]//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至二十辑摘编(上卷).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4: 100.
- [2] 何林. 阿怒人: 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4.
- [3] 《怒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怒族简史[M]. 修订本. 昆明: 民族出版社, 2008.
- [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 第三辑[G].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48.
- [5] 施帝恩·格罗斯. 族名政治: 云南西北部独龙族的识别[J]. 世界民族, 2010(4): 70-79.
- [6]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4.
- [7] 李方桂.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J]. 民族译丛, 1980(1): 3-9.
- [8] 罗常培, 傅懋勤.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J]. 中国语文, 1959(3): 12-15.
- [9] 西田龙雄. 藏缅语群藏语族概况[G]//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北京: [出版者不详], 1980: 83.
- [10] 孙宏开. 怒族柔若语概况[J]. 民族语文, 1985(4): 65-80.
- [11] 段伶, 李绍恩. 怒族柔若语概况[J]. 民族语文工作通讯, 1985(1): 12-15.
- [12] 谢飞. 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G]//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汉藏语言语言学论文选译. 北京: [出版者不详], 1980: 32.
- [13] 傅爱兰. 怒语(怒苏)系属研究[J]. 语言研究, 1989(1): 133-151.
- [14] 德宏州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 景颇族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文集[G]. 芒市: [出版者不详], 2007: 2.
- [15] 孙宏开. 独龙语简志[M]. 昆明: 民族出版社, 1982: 189.
- [16]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79: 27.
- [17] 张建章. 景颇寻根[M].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6: 134.
- [18] 肖家成. 景颇族的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M]//民族学研究: 第五辑. 昆明: [出版者不详], 1983: 12-16.
- [19]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 独龙族简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20] 赵学先. 景颇族文化大观[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88.
- [21]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怒族社会历史调查[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22] 刘达成. 怒族文化大观[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 [23] 《怒族简史》编写组. 怒族简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24] 德宏州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 景颇族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文集[G]. 芒市: [出版者不详], 2007.
- [25] 高志英.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J]. 学术探索, 2004(8): 102-106.
- [26] 尤中. 云南民族史[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181-183.
- [27] 尤中. 云南民族史: 上下册[M]. 修订本. 昆明: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 1985.
- [28] 尤中. 云南民族史: 下册[M]. 修订本. 昆明: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 1985: 46.
- [29] 宋濂. 元史: 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465.
- [30] 李道生. 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资料集[M]//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0: 48.
- [31] 洪俊. 独龙族源初探[M]//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至二十辑摘编.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4.
- [32] HTAIN K P. A History of Rawang Tribe[D]. Mandalay: Mandalay University, 1998.
- [33] 杨将领, 李金明. 中缅跨界独龙族: 自称与他称释义[J]. 世界民族, 2010(4): 80-85.
- [34]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849.
- [35] 李志恩. 怒族族源与迁徙[M]//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怒族.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35.